中国王朝时期治边策略 及其对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郭纹廷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北京 100094)

摘 要:对中国古代王朝时期大一统观念、治边政策、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民族文教等方面的回溯分析而知,历代王朝中央政府通过怀柔扶绥、因俗而治、儒化教育等政策措施,实现了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疆域稳固、民族融合。边疆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大一统观念,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潜在基础。中国古代王朝时期经略边疆的思想和实践对新时代边疆有效治理具有启示意义。新时代边疆治理应明确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是边疆地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边疆治理的战略核心任务,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以发展为核心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关键词:古代王朝时期;大一统观念;治边政策

中图分类号:K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21)05-0067-06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21.05.006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里,边疆地区的地理区域、人口、社会结构等不断发展变化,造就了各民族插花式交错聚居的状态,边疆地区与内地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强,形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一部中国史是我国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虽然古代历史上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但各民族在相互交往的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情感相依的格局。之所以腹边各民族能形成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整体,是因为在各民族内心深处都存有一种潜在的共同体意识和一种深层次的对大一统的认同,是这种情感与认同将中华各民族凝聚起来。

边疆地区是距离国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相对较远的地区。王朝时期中央政府经略边疆时如何实现疆域稳定、民族融合、腹边共同发展的?本文拟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探赜中国古代王朝时期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并对新

时代边疆地区有效治理提出探索性建议。

一、从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一统观念看边疆治理

王朝时期的中国既是多元的,也高度统一。传统中国的发展演变是以中原文明体系为载体,在中央王权的集中统治下,推动各民族交往、融合,促使中原农业文明不断向周边扩散和巩固的。《荀子·正论》中有云,“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是王之制也。”^[1]从“同服不同制”的思想就可以看出,古人认识到,边疆各地区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还是风俗习惯都与中原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应采取“称远迩而等贡献”差异化的制度。同时,古人也认识到,边疆各地区是中原王朝“一统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自秦朝统一华夏诸国,古代边疆正式形成之后,王朝统治者即确立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思想,要“并一海

收稿日期:2021-08-20

作者简介:郭纹廷,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边疆治理、区域经济、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内,以为郡县”,既要在新开拓的疆域全部纳入一体化的管理之下。汉朝时期,“大一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王者无外”和“内诸夏而外夷狄”两个方面。《盐铁论》记载,士大夫提出,内地与边疆的关系犹如人身体的腹心和四肢的关系,腹心和四肢完整,内地和边疆才能构成完整的国家,四肢强健身体才能强健。在此思想支持下,汉武帝动用武力开疆拓土,加强对边疆的控制与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人刘源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前秦苻生建立的政权,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少数民族在中原争夺“华夏正统”的斗争,体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对大一统思想的认同。隋唐统一之后,大一统的思想进一步强化。隋文帝倡导“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治边思想^[2]。唐太宗统治时期提出,“安辑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3]的大一统思想。隋唐时期强调华夷一视同仁的大一统思想,不但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也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北疆各民族,民族自立自强意识加强,对中国的认同意识加强,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契丹人建立政权后,便自称北朝,而称五代时期的后晋、后汉及此后的宋朝为南朝,至辽圣宗后期,辽人称五代及宋朝是“中国”,亦称自己为“中国”,认为“契丹、汉人是一家人”^[4],充分体现了辽人对大一统思想的认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400多年分裂时期,辽宋王朝南北对峙时期,以及五代十国的混争时期,边疆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统治始终没有脱离中国向外发展。清朝统治者从建立大一统王朝之后,贯彻的是“中外一家”的治边思想,如雍正皇帝在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基础上,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5]。可以看出,中国历代王朝所秉持的大一统思想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疆域巩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是非常有利的,虽然当时还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明确提法,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在各民族间深入人心。

二、从治边政策与国家认同看边疆治理

国家认同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合理的治边政策和措施能够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对执政政府的认同,反之则会弱化国家认同,甚至出现一些部族远遁、背离祖国的情

况,中外历史上此类事例不为鲜见。王朝时期统治者在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方面的治边政策,主要体现为将羁縻制度与因俗而治的思想紧密结合。上溯因俗而治可在《礼记·王制》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6]得以体现。其思想为,因为自然条件不同,各地居民风民俗有所差异,统治者不应强求风俗的统一,而应注重礼仪教化、顺应各地民俗文化进行统治。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郡县、属国、都护府,设立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地方机构,如蜀郡是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第一个郡县。同时,在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郡下设“道”,“道”是秦朝创设的与县平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在管理模式上与县有差异。施行“道”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一种对少数民族实行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度。两汉时期的治边政策更加注重因俗而治,通过设置西域都护、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等特殊机构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唐朝初期,唐太宗在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时,非常注重因俗而治,认为“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惰性者,心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7]。因而唐代建立了大规模的羁縻体制,基本政策是“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就是在不改变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基础上,任命部族首领为羁縻府州的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的管理和统治。元朝在行省下设置土官、元帅府、军民万户侯等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将中央的集权统治与地方羁縻统治相结合,也是一种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模式。清朝总结了历代边疆治理的经验,大力推行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如《盛京条例》《蒙古律书》《理藩院则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等,来管理边疆各民族。雍正王朝时期,在之前“柔远抚绥”政策的基础上,在西南边疆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司制度为流官制度,杜绝了土司弊端,使治理模式与内地直辖模式相统一,收到了边疆与内地发展一体化的效果,使西南边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清政府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迅速提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者也将怀柔远人的德化思想贯穿于对少数民族的治理理念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穷兵黩武、盲目扩张对国力的消耗和人民疲敝,

不仅有利于疆域巩固和稳定,还有利于在各民族间形成内聚力。因此,当国家的各项治边政策顺应民意时,少数民族不但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还会增强对政府的认同。

三、从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看边疆治理

边疆地区经济开发是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朝统治者在边疆地区通过土地开发、促进农业发展、转变经济结构、扩大对外贸易、构筑交通网络等方式,推动边疆地区经济建设,为边疆地区民族和谐稳定、各民族交往交融和腹边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屯田制度。汉武帝时期开始,通过向河西地区驻戍兵屯田和向各边郡移民实边,使整个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区,除了张掖属国的羌人和居延属国的匈奴人,全部为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汉人聚居区,不仅减轻了西域戍卫的粮食供给负担,还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经济和水利建设的发展,有利于两汉政府在西域广大地区实施有效管理,并进而将天山南北地区纳入祖国版图。同时,自西汉推行屯垦制度以来,西北地区农耕经济范围不断扩大,促使西北边疆由以牧业为主逐步向农牧并重的经济结构转变。此外,汉朝在北疆的大规模屯田,不仅使北疆边防得以巩固,也推动匈奴人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使其有了早期的定居居民,对匈奴人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耕生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唐朝初期,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实施羁縻政策,如规定“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8]可以看出,唐朝在羁縻府州的赋税负担比直辖区州轻得多,这也是唐代为了适应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政策。在东北、北疆、西北、西南民族地区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对于稳定边疆、促进边民稳定生产生活,保证边疆农牧业经济发展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唐朝与边疆民族的和亲,如唐和吐蕃的首次和亲,促进了双方民族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进入吐蕃,推动吐蕃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文化获得了快速发展。自西汉与南越国互通关市以来,中原王朝在边郡地区逐渐建立了互市制度,如东汉的互市对象是乌桓、鲜卑与北匈奴,隋唐时期主要是跟西北边陲的蛮夷互市,宋朝与契丹等

周边民族的互市不断,宋朝还在茶马互市中以茶、绢、瓷器等向西北民族买马以补充军中战马不足。明朝制定了“以茶驭番”的互市政策,积极推进边疆互市贸易,取得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9]的生动局面。清政府在互市贸易中获得大量战马,以满足征战的需要。互市贸易增进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带动了边疆地区的垦殖、手工业、商业和交通等多方面经济活动的发展。我国边疆各地区地理环境、民族特性、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王朝统治者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实施了各有侧重的边疆经济开发政策,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联系与互动,中原文化传播与影响以及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从文化认同和边疆民族文教看边疆治理

中国古代君王治理天下敦崇德治和礼教,礼教以儒家礼制为主要形式。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的治国与教化方针。儒家礼乐文化对于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秦代“书同文”,对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大分裂时期,社会动荡,冲突不断,南北先后建立了30多个政权,边疆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原汉族为避乱而向边疆地区迁居,这一迁徙混居的过程,为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汉族儒家文化之间交往交融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南朝政权在处理民族大迁徙的复杂局面时,均以“用夏变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德化”思想接纳并“声教”各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逐渐认同儒家文化及大一统思想。在大融合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不断接受儒家礼仪文化的熏陶,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礼仪规制、文化思想等逐渐实现了儒化,进而达到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了边疆治理的愿景。而北方诸政权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儒家文化作为政权统治的思想基础,采用“用夏变夷”的文教方针和政策,积极倡导儒学教育,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儒化的进程,最终为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隋唐统一时期,全国习读儒家经史达到了新阶段,出

现了“西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10]的学习热潮。隋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激发了边疆各民族诵经习儒的积极性,边疆民族士人举进士非常踊跃。元朝重儒兴学之风不减,将《四书》《五经》《孝经》译成蒙古文,让蒙古族世子习诵。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即发表诏书,下令要求提刑按察司,“勉励学校,宣明教化”,督促从京城到边疆各地的行政长官积极奉行尊儒兴学,兴办庙学的文教政策,起到了传播文化,实现社会教化的作用。明代更加重视对边疆民族的儒家经史教化,并积极鼓励各地兴办社学、义学、私塾教化边疆民族。清政府对儒家文化的作用有更深认识,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尊孔崇朱、以儒化夷、怀柔扶绥、渐化其民的文教政策与措施,并通过推行移民、兴学等有利于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认同的措施与办法,凝聚人心、笼络世子,不仅提高了边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涵养,也增强了各民族对大一统中国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归心和认同。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是边疆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经历缓慢的“四海一家”“华夷同风”的一体化发展过程。“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11]虽然古人治边思想中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诸如“夷夏之防”“以夷制夷”的保守思想,对边疆地区各民族进步发展存在一定的阻滞作用。但王朝时期统治者多以文化、文明的软实力来经略边疆治理,采取“以夏变夷”“因俗而治”的政策措施,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以中原地区的文明吸引、教化、包容边疆各民族,使其产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潜在基础,对于边疆稳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对新时代边疆地区治理的建议

费孝通曾说“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反映出我国边疆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及边疆治理的复杂性。边疆地区不仅是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区域,也是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最为关键的区域。从地域的历史特征看,

各民族因具有各自传统的民族文化、世居地域、传统的宗教信仰,而具有固有的本民族认同、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宗教认同等,这些基于情感归属的认同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状态。“如果公民间缺乏共同的领土认同,只有各自的族群认同,他们将难以形成更大的地理视野。”^[12]也难以形成持久的、牢固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近现代以来,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边疆地区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和运动持续存在,而且往往与宗教势力相勾结,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当前,疆独、藏独、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时有发生,边疆地区成为现代中国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培育是“国家通过强制力促进一些文化因素在领土范围内普遍化的行为”^[12]。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的边疆治理要解决的不仅是各民族自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已有基础上,深化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共同体意识。

第一,明确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是边疆地区治理的价值取向。自建党以来,面对国内国外双重斗争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将分散化的中华民族整合、聚拢在一起,让“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整合与统一。“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13]边疆地区的治理,首先应树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国家主义”为价值主导的治理理念。“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意味着,一是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思想基础,通过国家认同建设和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历史观,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二是充分调动和协调国家治理的各类资源,不断弥合边疆地区各民族、各地域的差异性,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边疆治理的战略核心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

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14]《共同纲领》中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充分保障了各民族的权益,而且在制度上奠定了民族团结的根基,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密切相关,当民族团结受到破坏损害时,国家统一就会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边疆地区的治理,一是“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15],坚决防范和制止各种形式的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活动。二是要消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否则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容易滋生民族歧视、民族隔阂,严重时甚至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的危险倾向。

第三,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就内在决定了新时代边疆治理涵盖了文化共同体的属性。新时代边疆治理,一是要关注边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多元性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多元”与“一体”关系,要多讲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在边疆治理过程中要加强各民族“五个认同”意识教育宣传,只有将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才能推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二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方法和载体,引导各族群众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核心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三是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基层文化阵地服务能力,广泛开展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四是传承发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激发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提升传统文化在各民族群众中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当面对境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等形式的渗透时,能够形成抵御渗透的思想自觉。

第四,以发展为核心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

总钥匙,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转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强调边疆地区发展的充分性和持续性,增强边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让边疆地区各民族分享国家发展的机遇,实现边地一体化发展,使边疆和内地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边疆治理应把加快边疆地区社会全方位发展进步作为首要任务。一是把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具体地区,把民生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支持边疆地区社会事业建设,加大民生领域投入,推进民族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作为政策导向,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运用灵活多样的支持和援助方式,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让“一个地区都不能落下”。三是推动城镇化网络体系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实施乡村振兴为契机,支持发展民族特色乡村旅游,转变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方式。四是制定新时代人口实边政策,建立人员双向流动机制,确保各民族人口比例均衡,解决边疆发展的人才问题。五是在立足国内大市场的基础上,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范围与力度,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找准战略切入点,服务于“一带一路”等国家整体战略。

第五,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实现边疆治理的根本途径。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常态。各民族要在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增进情感认同,达到情感交融、理念共通、共同发展。一是建立服务管理平台,鼓励和引导各族群众经商办企业,支持经营特色产品,为各族群众提供职业技能、自主创业、法律法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方面教育培训。二是营造安居乐业环境,引导各民族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以社区为平台,从工作、日常生活、娱乐等环节入手,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和社区环境。三是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多渠道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教育实践活动,多层次多样化开展民族联谊、互帮互助活动,搭建促进各民族沟通交流平台。四是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特定需求。五是依法治理,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妥善处理影响民

族团结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参考文献:

[1] 杨柳桥. 荀子诂译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480.
[2] 管彦波. 简论隋文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措施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6, (6).
[3] [宋]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 [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2: 331.
[4] 金史·卢彦伦传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715.
[5] 雍正. 大义觉迷录 [G].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期). 文海出版社, 1966: 4-6.
[6] [汉] 郑玄注, [唐] 孔疏达等正义. 礼记正义 [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46.
[7] [唐] 吴兢. 贞观政要·公正 [Z].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2: 232.
[8] [唐] 杜佑. 通典·食货六·赋税下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06.
[9] 明史·方逢时传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5846.
[10] 资治通鉴·唐贞观十四年二月条 [Z]. 北京: 中华书

局, 1956: 6153.

[11] 习近平.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B / OL]. 2014 - 02 - 17. http://www.gov.cn/lhdh/2014-02/17/content_2610754.htm.
[12] 周光辉, 李虎. 领土认同: 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7).
[1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EB / OL], 2019 - 09 - 2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7/c_1125049000.htm.
[1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 中国民族工作九十年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16.
[15]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N]. 人民日报, 2014 - 09 - 30.

[责任编辑 谷文双]

The strategy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China's dynastic period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new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GUO Wenting

(The Central Ethnic Cadr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great unity concept, borderland Policy, border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orderland culture and educ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f the ancient dynasties realized the social stability, territorial stability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the border area through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border areas had subtly formed the concept of unity, enhanced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the unifi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formed the potential basis for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ancient dynasties hav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border area in the new era.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should make clear that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leading core ar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regard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ethnic unity as the strategic core tasks, build a cultural identity with Chinese culture as the core,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ith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and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Keywords: Great Unity;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orderland Governance; National Identity